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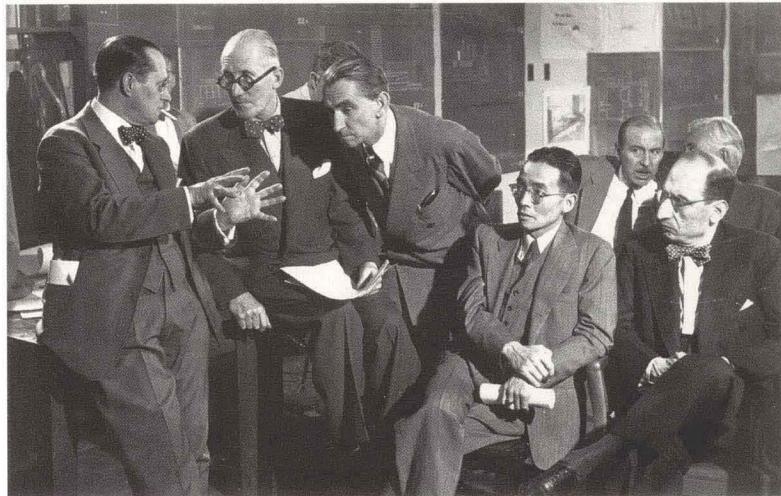
恩斯特·考米尔

勒·柯布西耶

符拉迪莫·包迪安斯基

梁思成

劳·方坦纳



1947年4月，梁思成在纽约与建筑师们讨论联合国总部设计。[Frank Scherschel 摄，Getty Images 授权]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 著

在神话终结处，历史的幽灵探出头来……

王澍、刘家琨、夏铸九、赵辰、杨奎松、梁文道 推荐阅读

如果说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则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 涛_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 朱涛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495-5008-1

I. ①梁… II. ①朱… III. ①梁思成 (1901~1972) - 人物研究

②梁思成 (1901~1972) - 建筑学 - 思想评论

IV. ①K826.16:2 TU-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497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陈凌云

崔健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965mm×1270mm 1/32

印张：12.25 字数：200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妈妈韩爱荣和妹妹朱煜
感谢她们对我的爱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梁思成《登桂林叠彩山》，1961年

前 言

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进了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

这段文字来自梁思成先生在 1951 年 12 月 27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检查《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我在 2009 年第一次读到他这篇检讨时，心中产生了一种幻灭感。我一直有的印象是梁思成在 1955 年因“复古主义”受批判，又在“文革”中备受迫害。但我完全不知道，在建国伊始，梁思成在忙着参与北京各种城建工作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批判，写一份又一份的思想检讨了。建筑史研究对此几乎只字不提，《梁思成全集》更没有收录这些材料。我下决心要探究这段历史。在过去三年中，我通过各种渠道，陆续搜集到一批梁思成在 1949—1959 年写的思想检讨。同时，我也阅读大

量史料，试图了解 1950 年代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想运动，以及它们对新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影响。

渐渐地，我开始看到两条线索：梁思成的系列检讨与“新中国建筑运动”之间的关系。如果说 1920 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我认为 1950 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

我于是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从分析梁思成的一系列思想检讨入手，将中国建筑在 1949—1959 年的发展过程梳理一遍。显然，这段历史非常沉重，揭开它时，令我，也会令很多人感到震惊、痛苦；但若回避它，我认为是一种罪恶，因为这等于是我们后人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对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一概加以唾弃。2011 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想通过这个写作，通过读解这段被尘封了的历史，来纪念他。2011 年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社会各界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日子，反思中国一个世纪来追求现代化的艰辛历程。我也想以几篇读解梁思成的文章，作为一份小小的个人礼物，献给这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但在 2011 年初，当我自觉资料搜集充分，开始写作时，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每每涉及他一篇篇检讨中对自己在 1949 年前“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时，我都得回过头去分析他以前的思想和作品。我频频回头，细读他以前的写作和各种相关材料，才意识到，自己对 1949 年前的梁思成的了解又是多么肤浅。同时我也发现，原以为 1949 年前的梁思成已经被众多学者研究得很透彻了，但其实还存在

着很多空白，甚至谬见。于是，我调整计划，先在 2011 年内，用两篇文章，把梁思成在 1931—1946 年做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梳理一下：第一章集中探讨他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和方法论，第二章探讨他受到的西方和日本现代建筑史学的影响。然后，我就可以集中用下面几章写 1949—1959 年的梁思成了。

没想到，接下来越写越细，越写越长。断断续续花了两年时间，直拖到 2013 年秋季，一共又写出六章，我才感到算是对建国十年间的梁思成有了比较完整的考察。我意识到，只有耐心地扎到繁复的史料细节中，将考察还原到逐年甚至逐月逐日，才能精确捕捉当时历史风云的急剧变幻，也才能逐一击破众多后人对于梁思成想当然的空论和以讹传讹的谬见，最终可望深刻理解当年梁思成的心路历程，以及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与那个时代的关系。

多年来，对梁思成的读解流于空洞的缅怀和颂扬，而鲜有将他的思想、作品纳入特定历史语境中，贴近而又动态地分析。我期待自己三年来的工作，能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我也敬请读者指正我的错误。

2013 年 11 月，香港

目 录

前 言 / i

第一篇 中国建筑：史学的构筑

第一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 / 3

第二章 强梁无畏 / 55

第一篇总结 梁的史学 / 106

第二篇 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

第三章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 111

第四章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 / 139

第五章 大屋顶检讨 / 165

第六章 从争鸣到反右 / 199

第三篇 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

第七章 想象城市与制度 / 231

第八章 “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 / 269

第二、三篇总结 十年，今天 / 325

注释 / 336

附录 章节概要 / 369

致谢 / 376

第一篇

中国建筑：史学的构筑



1937年，梁思成及其同仁骑驮骡进五台山寻找佛光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第一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

（1931—1946年）

梁思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我们熟知的。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梁思成在政治上相信，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国家是其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在文化方面，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它有复兴的潜力。这两种信念紧密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梁思成一生的建筑事业。在1931—1946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集中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他们努力想通过“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证明中国古典建筑与希腊、罗马和哥特式等建筑体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文化品质，是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那个时期的梁思成还认为，中国传统木建筑框架体系与20世纪在西方崛起，并在世界迅速传播的现代建筑，在原理上有共通之处，因而它有向现代转化的可能——这构成他当时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动力之一。

但要深入读解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仅仅重复他的民族主义信念、动机、动力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他是如何做的，即他的建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是如何构筑起来的，他采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等等。由此，本章尝试：将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放在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背景中，考察两者间的关系；考察梁思成的建筑史写作中，理论构筑与实证调查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更贴近的读解方式，考察梁思成及其同仁的建筑史研究中蕴含的丰富性和矛盾性，而不是一味强调其系统性。

一、从观念到方法

20世纪中国史学革新的首要特征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¹ 1902年，在《新史学》的开篇，梁启超这样论述史学与民族主义的紧密关系：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²

梁启超这种史学促进民族主义的信念，与19世纪晚期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密切相联。历史进化论源于18世纪晚期德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历史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演化的过程；永恒不变的理想和法则是不存在的，人们只有在

特定历史阶段的语境中，通过考察过去，来明察现在和预测未来。到19世纪中晚期，历史主义又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进化论史观，该史观在总体上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线性，由低到高，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在具体论述时，它往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衡量各单位的先进或落后，提倡相互竞争与适者生存。对梁启超，以及很多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家来说，这种学说极有吸引力，因为它既能解释世界局势的变迁、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没落，也能成为他们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力图促进中国再次复兴的理论基础。³“进化”成为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关键词。他在《新史学》第二篇“史学之界说”中，以三个层层递进的定义来说明他的史学“新”之所在：史学是“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换句话说，梁启超“新史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叙述，把人和社会进化的道理讲出来。在第三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梁启超再次强调历史进化和人种进化的直接联系：“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梁启超进一步说，在各人种中，那些“非历史的”，即不会总结自己历史的人种，就只能被其他“有历史”的人种排挤。⁴总之，梁启超深信，在民族—国家的进化过程中，史学的发达起着巨大推动作用。此时，梁启超推广的主要是进化史观，尚未将进化论发展到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

这里我插入一个有趣的问题：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中常有一些生物体隐喻，是否可直接理解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呢？比如，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介绍中国木构建筑时，口气就像达尔文在讲某个“物种”的起源和进化：

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孕育并发扬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成熟并逞其豪劲于唐代；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然后于明代初叶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虽然很难说它的生命力还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书所述及的三十个世纪之中，这种结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机能……⁵

一些学者确实将这种文字直接与生物进化论相联⁶，但我认为不应轻易下此判断。因为，以生物体的生长衰落来比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是自古就有的手法，其中起里程碑作用的人物是被称为“艺术史之父”、“现代考古学奠基人”的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J. Winckelmann）。他在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中将艺术发展过程归纳为类似生命的循环周期，每一周期都有“起源—发展—变化—衰亡”四阶段。以此为模板，他将古希腊雕塑发展划分为四阶段：旧式风格（Older Style）、盛期或宏大风格（High or Grand Style）、美丽风格（Beautiful Style）、模仿者风格（Style of the Imitators）。⁷这个划分通常被认为是艺术史写作上首次将艺术发展界定为有机的生长—衰落过程。尽管也有学者争辩，温克尔曼其实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一些古罗马作家对希腊雕塑的论述⁸，但温克尔曼的重大意义不容忽视。他的写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后一批18世纪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系统地发展出“历史主义”理论，构成西方现代历史写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历史主义到了19世纪中后期才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我将在其他篇章中详细探



图1 王国维（1877—1927年）



图2 胡适（1891—1962年）



图3 梁启超（1873—1929年）

讨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的关系。总之，就梁思成文字中的生物体比喻，尤其他对中国木构建筑发展的四阶段划分（“发育”—豪劲—醇和—羁直）这点上，我认为系统考察温克尔曼和西方历史主义史学观的演变，远比直接类比生物进化论更有意义。前者可以帮助我们回溯西方现代史学的思想脉络，而后者只能停留在一个浅白的打比方层次上。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进化论作为一种史观，被用来考察社会和文化的演变，构成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有力批判。但它长时间停留在较肤浅的生物学隐喻层面，直到1910—1920年代发展成一种史学方法论后，才促进了中国史学的更深刻变革。

在1910—19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史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从重视史观的改造转变到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改造。王国维、胡适、梁启超（图1—图3），以及稍晚些的傅斯年，成为这一趋势中的四位代表人物。

王国维的史学贡献，由陈寅恪精辟地概括为三点，都与史学方